

2022“地球卫士奖”获得者塞西尔·比比安·恩杰贝特：

为喀麦隆农村妇女争取土地权益奋斗30年



图源:联合国官网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张轩甄

日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将2022年“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授予喀麦隆女性权益与环境活动家塞西尔·比比安·恩杰贝特,以表彰她坚持不懈地倡导非洲妇女获得土地所有权、促进恢复生态系统、消除贫困、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杰出贡献。

早在今年5月,恩杰贝特就得到了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高度肯定。粮农组织副总干事兼森林保护基金主席玛丽亚·海伦娜·塞梅多表示:“本次颁发的旺家里·马塔伊森林冠军奖,旨在表彰塞西尔·比比安·恩杰贝特在过去30年里为促进妇女的土地和森林权利所做出的奉献。妇女参与森林治理和保护对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她就是很好的例证。”

因童年的经历而觉醒

恩杰贝特在喀麦隆的一个偏远地区长大,她见证了农村妇女经历的逆境与磨难。种植庄稼、饲养家畜、抚养孩子,这些都是妇女身上的重担。然而,受限于喀麦隆传统的社会文化习俗,在这片土地上日夜艰苦劳作的妇女却永远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

据统计,近70%的喀麦隆妇女生活在农村地区,她们依靠从森林中采摘水果、坚果以及药材帮补家计。然而,“当女人失去了丈夫后,由于家中没有男丁继承财产,妻子虽然曾与丈夫一同耕耘多年,但土地很快就会被夺走。”恩杰贝特说,“寡妇根本就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证明文件。”

早在童年时期,恩杰贝特见证了母亲、姐姐和村里其他喀麦隆女性身上挥之不去的痛苦。恩杰贝特回忆道,“我当时就意识到,女性在苦苦挣扎。我想好好保护我的母亲,为这些农村妇女发声,改善她们的生活。”这激励她为喀麦隆农村妇

女的权益奋斗了将近30年。

喀麦隆的传奇女性

恩杰贝特毕业于中非天主教大学,就读博士期间研究课题为“喀麦隆沿海地区的农村妇女的性别关系、土地获取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拥有34年实地工作经验的她,在性别与土地使用权、性别与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性别与气候变化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与丰富的经验。她是农学家、社会林学家、性别问题专家、妇女领导力培训师和顾问。

恩杰贝特起初是喀麦隆的一名公务员,后来加入民间社会组织。2000年,她创建一个名为“喀麦隆生态”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倡导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女性群体对森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2009年,她与一群非洲妇女权益倡导者成立了非洲妇女森林社区管理网络,旨在促进非洲妇女获得平等权利,她是该网络的主席。

恩杰贝特通过国家性、地区性和全球性机制平台赋权妇女,应对气候变化。她身兼多职,是:非洲女性领导力培训师、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民间社会咨询小组的非洲法语区协调人、非洲妇女促进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变革组织培训师、世界银行森林碳伙伴基金的妇女观察员、非洲森林论坛理事会成员、森林和农场基金与粮农组织领导的倡议指导委员会成员、非洲法语区妇女主要团体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进程的组织伙伴。

妇女在生态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获得和拥有土地和森林资源方面受到性别歧视,难以发挥出自身的潜力。恩杰贝特表示:“妇女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要能够真正影响到决策过程。我们需要增强意识,提升能力,拓展资源,通过拓宽女性网络,与男性携手合作,最终使男性也成为性别平等的倡导者。”

恩杰贝特为喀麦隆林业和土地法的改革建言献策,正式的修订法律文本即将付梓问世。

作为世界银行森林碳伙伴基金的妇女观察员,恩杰贝特代表着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妇女。在全球变暖问题方面,她为妇女获得更多的气候融资而奔走四方,并承诺继续倡导为农村妇女设立专项基金,以帮助她们在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与适应、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能更好地发挥女性领导力的作用。

恩杰贝特深知,由于缺乏相应的电力设施,信息通信对于喀麦隆农村地区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她提倡减少喀麦隆妇女获得信息的技术性障碍,要让她门负担得起相关费用。同时,她提议扩展与农村广播节目的伙伴关系,向喀麦隆农村更多受众传递信息。

她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时说道,荣膺“地球卫士奖”是意外之喜,这个奖项对她而言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不断前进的动力。

再见,赫比

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创始人去世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朱亚琦

据路透社报道,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组织联合创始人博纳菲尼于当地时间11月20日去世,终年93岁。阿政府呼吁为她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

赫比·博纳菲尼是一位母亲,也是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协会的联合创始人、领袖、左翼社团的旗帜性人物。11月24日,无数阿根廷人自发组织了对这位伟大的人权捍卫者、斗争者、和平促进者的告别仪式,以纪念她自1977年4月30日以来对阿根廷人民的公民权利、真理、公平和正义做出的特殊贡献。

博纳菲尼说她的青年时代是幸福的。她出生于阿根廷恩塞纳达,与温贝托·阿尔弗雷德·博纳菲尼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豪尔赫·奥马尔·劳尔·阿尔弗雷德和玛利亚·亚历珊德拉。他们是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的学生。大儿子豪尔赫·奥马尔学习物理学,并担任两门学科的助理。他是阿根廷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员。小儿子劳尔·阿尔弗雷德在自然科学学院和该校博物馆学习动物学,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成员。可一夜之间,博纳菲尼的生活坠入地狱和痛苦。1977年2月8日,26岁的大儿子豪尔赫在拉普拉塔市被绑架,此后杳无音信。小儿子于1977年

12月6日在贝拉萨特吉市被绑架,时年24岁。她的大儿媳玛利亚·埃琳娜·布诺内·塞佩达也同样被绑架,人间蒸发。

“失踪”事件在当时的阿根廷时常发生,因为1976年到1983年是阿根廷现代史上最黑暗的独裁统治时期。以时任阿根廷总统的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为首的阿根廷极右翼团体以“国家安全”为名,大量非法通缉和捕杀反对派,关押、殴打、杀害左翼士兵或平民,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此期间,大约有3万名左翼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失踪,受到酷刑折磨甚至被秘密杀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35岁以下。这场残酷的镇压被称为“肮脏战争”。

母亲们因无故失踪的儿女们痛不欲生。从1977年4月30日起,痛失儿女的14位母亲用她们特有的白色手帕遮住头发,拉起抗议标语,高举失踪孩子们的照片,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前的五月广场绕圈奔走,为那些“被失踪”的孩子们讨公道,为所遭受的一切人为制造的劫难和灾祸呐喊抗议。她们的痛苦、愤慨、哭泣被记者拍下,阿根廷独裁军政府的暴行终被公之于世。她们求见军政权领导人魏地拉并要求当局为失踪的孩子负责,为家破人亡的生活负责,为所有阿根廷人留下的血泪负责。慢慢地,越来越多人加入她们无助绝望的抗议行列,据统计,有300~400位母亲参

加寻找失踪孩子的队伍,随后越来越多男性以及母亲们的朋友也加入队伍。他们一起向世界揭露了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对人民镇压的恐怖、暴力和残忍,从此走上了维权和抗争的道路,也走上了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路。因为回应母亲们的是军政府的对话,而是一轮又一轮的暴力镇压。

1977年12月,母亲中的多位领导者被逮捕杀害。第一位召集者阿苏塞纳·维拉弗洛尔便是其中之一。而博纳菲尼幸存下来。1979年博纳菲尼担任“五月广场母亲”组织主席。1981年始,“五月广场母亲”将每周四作为抗议游行日。该组织也开拓了广播电台、杂志社、慈善机构、建设公司等单位,并结合各种左翼反对力量,转型成了庞大的民间运动团体为消失的孩子们伸张正义,也成为推动阿根廷民主转型的一股力量。1985年,这些勇敢的女性终于能够在作家埃内斯托·萨巴托主持的失踪人口全国委员会前作证,调查已经于1983年垮台的魏地拉政府的罪行,这份以《绝不》为名的调查报告也将此前军政府的大屠杀行径和其挑起的肮脏不堪的战争露出水面。

到今天,五月广场母亲们仍然是这个南美国家的一个有力象征。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阿根廷政府和人民认为,她(博纳菲尼)是为3万失踪人员寻找记忆、真相和正义的国际象征。”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性别不平等使妇女感染艾滋病毒风险增加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报道 在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到来前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报告称,不平等现象正在阻碍艾滋病大流行的终结,按照当前的趋势,世界将无法实现为消灭艾滋病共同制定的全球目标。

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1年,全球新增大约15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这使得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总人数达到3840万。同年,有大约65万人死于跟艾滋病相关的病症。

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危险的平等》报告首先指出,性别不平等增加了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21年新增艾滋病毒携带者中有63%为妇女,而15至24岁的青少年女孩和年轻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更比同年龄组的异性高出三倍。

同时,有害的性别刻板形象也在阻碍艾滋病大流行的终结,对男子气概的固有认知让男性艾滋病毒携带者不愿寻求治疗。报告显示,在2021年,有80%的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获取了相关治疗,而这在男性中的比例仅有70%。

对一些关键人群的歧视、污名化和刑事定罪也在造成生命的损失。数据表明,过去十年间,不管是在西部和中部非洲,还是东非或者南部非洲,男男性行为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新增人数没有显著下降,这一重点人群获得艾滋病毒防治服务的途径普遍较少。

在世界各地,有超过68个国家仍然将同性性关系定为刑事犯罪。报告中的一项分析显示,相对于生活在相关法律最为严苛的非洲国家的男同性恋者,在相关法律最为宽松的非洲国家当中生活的对应群体得知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要高出三倍以上。

成人与儿童艾滋病毒携带者在接受治疗方面存在的平等同样需要加以应对。数据显示,在2021年,全球仅有52%的儿童艾滋病毒携带者正在接受能够拯救生命的抗反转录病毒治疗;而在成人艾滋病毒携带者中,这一比例则达到76%。

艾滋病规划署强调,儿童虽然只占艾滋病毒携带者总数的4%,但却在所有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中占到15%,弥合治疗的差距将拯救儿童的生命。

联合国儿基会指出,在2020年,携带艾滋病毒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覆盖率在许多地区也出现下降;尤其在亚太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这一趋势到了2021年仍在持续,这使得新生儿的生命面临更大的风险。

仅在2021年,新生儿感染艾滋病毒就超过了7.5万例,这是由于孕妇未能获得诊断并开启治疗。

为了确保到2030年所有携带艾滋病毒的儿童都能够获得治疗,同时防止新的婴幼儿感染艾滋病毒,儿基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已在今年8月1日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全球联盟,旨在将新的改良药物、新的政治承诺和不同社群的坚定行动结合在一起。

该联盟将在接下来的8年内持续运作,直至2030年。除联合国机构外,联盟成员还有包括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在内的民间社会运动、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国际合作伙伴。

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称近五年,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的案例显著增加

废除奴隶制国际日:携手努力,彻底消除现代奴隶制

在废除奴隶制国际日(每年的12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致辞,指出现代奴隶制正在抬头,边缘化群体面临的风险最高,并呼吁各方携手努力,采取更多的行动,消除现代奴隶制。

1949年12月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约的通过,每年的12月2日被定为废除奴隶制国际日,旨在消除现代奴隶制问题,如人口贩运、性剥削、童工、强迫婚姻以及强行招募童兵。

古特雷斯援引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现代奴隶制估计: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报告中的数据指出,近五年来,现代奴隶制正在抬头,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的案例显著增加。2021年,全球约有5000万人身陷现代奴隶制,比2016年新增1000万人。该报告指出,现代奴隶制几乎在世界

各国都会发生,不分种族、文化和宗教。超过一半(52%)的强迫劳动和四分之一的强迫婚姻发生在中高收入或高收入国家。而且边缘化群体面临的风险最高,如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移民、性少数群体等,妇女和儿童的处境尤为脆弱。

括在从事最恶劣形式的一些童工、采矿和采石。包Christine Nesbitt/儿基会



世界劳工组织启动了新的强迫劳动观察站,以便搭建一个“一站式”的数据平台,用于收集和提供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强迫劳动的相关数据。基于公开可靠的信息来源,劳工组织概述了187个成员国的强迫劳动现状,并总结了各国的应对办法。

(来源:联合国网站)